



和平国际环境为深化改革护航

■贾庆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直接涉及外交的改革主要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说,它回应了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界许多人长期以来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与外界建立了联系,党和军队也与外界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可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我国的外交事务,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外交关系。由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都有自己解读和落实外交目标的视角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总体上统筹国家内外需求和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合理的外交战略,如何让各个部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加强协调,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的外交战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越来越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近几年,国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建立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等等。但由于各种原因,总的来说,效果还不是十分理想。

其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解决我国涉外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很有必要。在对外关系问题加强协调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的体制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当前,我国主要由国务委员协调外交事务,但其协调的力度比较有限。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成立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没有常设机构负责协调日常工作。在没有国家法定授权的情况下,二者实际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这些体制方面的原因,我们也需要成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实体机制来应对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张正河

庆、沈阳、西安、大连、天津、兰州等20座。每城市可容纳约300万~1000万人,约1.5亿人。

第三级为省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约有50个,一般是每个省区一个,大多是各省的省会或前三位城市。每城市可容纳约300万人,约1.5亿人。

第四级为省辖一级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约有200个(西部地区的地级城市一般没有太大的人口容量)。每城市可容纳约50~100万人,约1.5亿人。

第五级为县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镇),约有3000个。每城可容纳约20万人,约6亿人。

这五级城镇可容纳11亿人,2030年中国总人口在16亿以下,届时城镇化率将达70%左右。

城镇化不能影响人们的吃饭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如何解决?就要实现现代集约高效农业,现在有两条道路可走:第一条是建立私有大农庄,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进而实现集约;私有大农庄就是拉美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结果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大量的农民被迫流入城镇,在贫民窟艰难求生。学者们称为

拉美陷阱。在我国,一定条件下可以试验,东北、西北土地辽阔地带已建立了一些家庭农场,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并有效地解决了城镇化劳动力不足和产量下降问题。第二条路是建立合作股份制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后者可能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长远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农民而言,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在工厂干活吃商品粮,这是多少年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梦想。城镇化给农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但要让梦想变成现实,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应是

拉美陷阱。在我国,一定条件下可以试验,东北、西北土地辽阔地带已建立了一些家庭农场,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并有效地解决了城镇化劳动力不足和产量下降问题。第二条路是建立合作股份制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后者可能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长远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农民而言,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在工厂干活吃商品粮,这是多少年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梦想。城镇化给农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但要让梦想变成现实,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应是

拉美陷阱。在我国,一定条件下可以试验,东北、西北土地辽阔地带已建立了一些家庭农场,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并有效地解决了城镇化劳动力不足和产量下降问题。第二条路是建立合作股份制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后者可能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长远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农民而言,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在工厂干活吃商品粮,这是多少年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梦想。城镇化给农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但要让梦想变成现实,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应是

拉美陷阱。在我国,一定条件下可以试验,东北、西北土地辽阔地带已建立了一些家庭农场,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并有效地解决了城镇化劳动力不足和产量下降问题。第二条路是建立合作股份制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后者可能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长远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农民而言,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在工厂干活吃商品粮,这是多少年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梦想。城镇化给农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但要让梦想变成现实,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应是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时事漫话

文化传播应走“接地气”路线

■黄墨白

近日,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以下简称《星星》)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追剧热潮。从《蓝色生死恋》《大长今》到《来自星星的你》,韩剧在东亚文化圈的热播一浪高过一浪。而2012年,一首《江南Style》的迅速传播,更是让全世界都仿佛置身首尔江南区的繁华景象当中。面对强大的媒体传播效应,我们不得不说,《星星》的热播又一次成功的国家文化输出。

如果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是以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生活方式为土壤的“现代文化”,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有赖于全球现代化的“顺风车”之嫌,那么同作为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其文化传播策略之成功,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文化也伴随着交往的深入而相互传播。与中国日益崛起的政治、经济地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仅仅局限在中国功夫、自然景观、中国建筑等等最先打入全球文化的意象当中。

然而,文化,不仅仅是具体的意象,更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内涵。如果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

神文化三个层面,那么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让他者了解本国的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而是通过各种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让他者理解并最终接受其所传达的精神内涵。韩剧在东亚文化圈的普遍受捧,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而反观中国的文化传播,却恰恰相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对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国物质文化的接触率最高,也最感兴趣。一些行为文化如中医、中国诗词由于与他们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相悖,文化传播效果有限,而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效果最差。

王岐山在去年的两会上曾表示“韩剧的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曾经热播的韩剧《大长今》不只是传播了饮食文化,更是以其为包装,展示了东亚文化圈所共享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的孔孟之道,还是对厨艺和医术的传承与放大,都在潜移默化中让人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并心甘情愿地接受。

同样是讲故事,为什么我们没有别人“讲得好”?同样身处儒家文化圈,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传播就只能停留在“功夫片”的层面上?

韩剧火,因为他们的制作团队有先进的制

作理念,有敏锐的市场观念,更在于他们注重伦理道德,善于将剧情与韩国文化特色融为一体,他们输出的是文化产品,更是伦理道德,这是最高明之处。

除此以外,与其他国家“接地气”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我国媒体目前仍侧重于说教式、灌输式的传播方式。我国的各种形象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由于不是当地民众自发或者自愿去学习、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而是中国通过设立孔子学院、播放主流宣传片的方式向海外输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很难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服,给人一种深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控制之感。

3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李安的成功之道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文化传播之路提供些许借鉴:李安的电影,无论其故事背景是中国还是美国,其时代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始终传达出人性中共通的善和大爱,再加

“农民转为市民”的城镇化,让2亿~3亿的农民真正进城,而不是如前几十年那样把广大的农民排斥在中国城市文明的进程之外以及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也是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沿海与中西部之间、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三大差距”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离开农村进城生活的农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即有工作,有房贷,有饭吃,寝食安定,衣食无忧。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镇常住人口一年间又增加了2103万。从数字上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的确很快。但当我们深入了解城镇化民生现状、生活质量的时候,便会发现,有相当多的人,城镇是进了,却没被“化”进去。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并未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许多人虽在城镇安了身,却难以立命,生存陷入困境,成了边缘人、夹层人。人成了城里人,日子却没过得跟城里人一样,这是许多“农转非”者的尴尬处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翟小芸供图

国际化的创作团队以及标准化的制作流程,使全世界的人们都能从故事背后读到他对超越于民族和国家的,属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关怀。

文化传播,其实无须“高大上”的宏大叙事,只是关乎是否抵达人的内心深处。

对于科学共同体而言,科学划界问题可以把科学与非科学和伪科学区别开来,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要划界,当然得有划界标准;不用说,划界标准首先与不同论者所持的哲学立场有关。

例如,实证论借助经验的回可回答性划界,理性论借助符合科学方法的准则划界。西方学者贾丁(N·Jardine)则列举出对划分边界的两个视角——本质主义的视角(波普尔、默顿、库恩都选择本质主义的解决办法)和建构主义的视角:“本质主义为确定唯一的、必然的和不变的质的可能性和分析的需要辩解,这些质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实践和产物分开,并说明它的独特成就(关于外部世界的有效的和可信赖的主张)。建构主义争辩说,没有划界原理不变地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把科学与其他知识生产活动分开是在与境上偶然的和利益驱动的实际主义的完成结果。这种完成结果有选择地依靠不一致的和模糊的属性。”

由于哲学立场的差异,也形成不同的战略性的划界标准。巴茨认为,有四种哲学战略,它们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尝试具有某些优点。其一是康德战略,即可靠的认识形式:确定可靠的规范,用当时最好的科学例示这些规范,接着把伪科学分类为对这些规范的偏离(形而上学和其他超验知识的主张)。其二是雷舍尔战略,即预言和控制。对科学来说,两个目标占据着对科学来说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突出位置:预言的明确性和控制环境的成功。科学在竞争中赢得胜利,不是因为它的优越内容,而是它在预言和控制中实用主义的成功,其他说明框架无法与之匹敌。其三是格林鲍姆战略,即认知的可解释性。格林鲍姆坚持“以自然科学为特色的那类认知可解释性”,这本质上把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基于归纳和演绎逻辑原则的严格的和详尽的批判联系起来。其四是亨普尔战略,即健全假说理论。亨普尔列举科学假设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提出它们是加于科学理论选择的不精确的限制。不用说,划界问题直接与科学的定义或科学性(scientificity)的内涵有关:有了准确的、明晰的定义和内涵,就比较容易在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作出区分。

尽管反对划界论者对划界论者的划界标准或方案——特别针对证实标准和证伪方案——逐一进行反驳,但是后者不甘示弱,依然我行我素,不断推出新的划界标准。这些标准基本上是以科学,尤其是以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为标志的,这些特征却是非科学或伪科学不具备的或不明显的,它们实际上属于科学性的范畴。

例如,罗森把客观性视为最重要的划界标准。巴茨看重“真”这一标志:自然科学文本在可容许的诠释范围的尺度上比伪科学的文本更接近告诉真实的文本。李克特把抽象性和可检验性看作科学文本的特点。霍奇森视理论的普遍性和经验的可重复性为不可或缺的标准。利普斯则立足于充足理由律划界;在任何命题中,主语必须包含谓语的充分根据;命题必须在经验中和在思维规律中具有充分的根据;命题必须在其他命题中具有根据(即它们必须从普遍的命题中可以演绎出来)。充足理由律划定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由于科学和科学理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方法决定的,而其他传统文化部门不用或罕用科学方法,因此方法作为划界标准很早就被提到议事日程。

由于单一的或个别的划界标准难以或根本不可能把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区分开来,有些划界论者便针对科学知识体系——也涉及作为研究活动和科学建制的科学——提出综合性的划界标准。沃尔珀特指出,对于有资格作为科学的对象,它至少需要满足若干标准:它处理的现象应该能够被独立的观察者确认;它的观念应该是自我一致的;它提出的说明应该能够与其他科学分支联系起来;少数定律或机制应该能够说明形形色色表现上更复杂的现象;理想的话,它应该是定量的,它的理论能够用数学表达。威尔逊言之凿凿:“科学不同于伪科学的显著特征首先就在于科学知识具有可重复性;同一现象可以重复研究,最好是由不同的研究者来进行,通过新颖的分析和实验,这一研究得到证实或否定。其次,经济性:科学家试图将信息抽象为既简单又美的形式,这种结合称作雅致,这样就可以通过最少的努力获取最多的信息。第三,可测量性:如果某种东西可以用人们普遍接受的尺度予以精确的测量,那么对这种东西所作的概括就会很清晰。第四,启发性:最好的科学可以激发进一步的发现,通常是向着未预见的新方向;而新的知识又再次检验导致作出这一发现的最初原理。第五,也是最后,契合性:在对不同现象所作的诸多解释中,只有那些可以相互联系并被证明彼此一致的解解释可以存在下去。”

有些综合性的划界标准不仅把整个科学或科学的三大内涵涵盖在内,甚至囊括整个社会和文化与境。撒加德认为,划界的判据需要一个包含三个因素的矩阵:理论、共同体和历史情境。他得出的结论是:“作为科学或非科学的划界对象不是观念或命题,甚或不是理论,而是领域(fields)。一个领域应该被理解为包容理论、它们的应用和该领域实践者在内的历史实体。因此,它是一种社会的以及认识的概念。”

泰勒则从修辞视角看科学划界:划界是具有重要的社会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后果之实践的、修辞的实现。这突显下述事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把科学理解为相互渗透的理论和实践的复杂“生态系统”。他提出作为实践内容的划界观,该实践是通过科学家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活动中在修辞上议妥的。至于有些划界论者和当代知识科学的激进派、文化相对主义者把问题推向极端,认为根本不存在科学划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标准,把科学划界视为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社会团体的纯粹约定,则未免失之偏颇,实在不足为训。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科学划界的标准

■李醒民